

清代塞外贸易的山西忻代商人

郭娟娟 王泽民 刘建生

摘 要：忻代商人是指清代祖籍地为山西省忻州、代州两地的商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归化城设关后兴起，鼎盛于清末民初，在塞外地区商界占有重要地位。忻代商人虽引起学界关注和重视，但缘于史料缺乏，鲜有专论。本文借助新发现的清代档案及家谱资料，概述忻代商人兴起历程与经营区域、群体规模与经营内容，并探讨其迅速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清代塞外 忻代商人 个案分析

忻代商人指清代祖籍地为山西省忻州、代州两地的商人，包括今天行政区划属于忻州市辖区内的忻府区、定襄、静乐、崞县（今原平市）、五台、代县、繁峙县^①。乾嘉以降，在蒙古、新疆地区经商的忻代商人成为晋商中的一支。忻代商人较之其他晋商，更具备与塞外蒙古、新疆地区贸易的地理优势，然其自兴起至民初，几未出现类似晋中商人的大族。缘于史料缺失，学界对于忻代商人鲜有专论^②。本文通过解读新发现的清代档案及家谱资料，概述忻代商人的兴起历程与经营区域、群体规模与经营内容，并通过个案探讨忻代商人迅速衰落的原因。

一 忻代商人兴起历程与经营区域

忻代商人兴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归化城设关后，于清末民初发展至鼎盛。由于地近塞外，忻代商人经商区域主要集中在蒙古、新疆地区。

（一）忻代商人兴起

忻、代两州处于途经东西口进行北路贸易之交通要冲，康熙中叶后，蒙古地区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清政府对内地民人进入蒙古地区的商贸活动持鼓励态度，发给通商路照，允许内地边民到口外耕种或经商^③。忻代商人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归化城设关后^④，他们由于地利之便，加之熟悉边情，“多往服贾以致富”^⑤，贸易于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者甚众^⑥。《乾隆忻州志》记载了清代蒙故经济政策变动对忻、代两地的经济影响：“迩年来，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城营谋开垦，春季载耒耜而往，秋收橐囊而还。予初至，恐其迁徙靡定也，后访得其实，乃知人烟辐辏，食指繁多，分其少壮于口外，实养其老弱于家中也。”^⑦归化城设关，加之地少人稠，家中富余人口通过“走西口”至归化“营谋开垦”。在这些人中，既有营谋经商的，也有佣耕垦荒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耕农之家十居八九，贸易商贩者十之一二”^⑧，从商人口比例较高。

据忻、代两州地方志中“孝义”和“节烈”卷记载，因家人经商而行“孝义”和“节烈”的家庭，光绪时期较以往明显增多。《乾隆忻州志》载因贸易而行“孝义”者只有彭珑 1 人^⑨，而《光绪

忻州志》则有侯进璋、张树仪等 5 人，且其中对“孝行”记载着墨颇多。这些人多为世代商人家庭，因父辈经商在外，以子辈成人后而寻父的“孝行”居多。侯进璋的父亲“于乾隆壬寅年（1782 年）赴山海关外，计离家二十三年”^⑩；张树仪“其舅氏货麦为业，遂往依焉”；郭王庸“其父贸易苏州，久不返”，后辗转至苏州，遇“忻之商于苏者询之”^⑪，才得到父亲消息；郭利仁“有先人遗肆于塞外”；杨生荣“父万仪携弟，随祖父至新疆贸易”，而他本人“服贾河曲”^⑫。有关丈夫出外贸易故去而行“节烈”的妇女，《乾隆崞县志》没有记载，且明确当地风俗“崞俗务农业而少行商”^⑬；而《光绪续修崞县志》则记载因贸易而“义行”的有 3 人，“孝妇”4 人^⑭；《乾隆忻州志》记载有 6 人，《光绪忻州志》记载有 9 人^⑮。《雍正定襄县志》中没有因贸易而“义行”和“节烈”的记载，《光绪定襄县补志》中则记载因家人经商在外而行孝悌人数有 4 人，隐德 2 人，节烈 6 人^⑯。由此亦可见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忻、代两地经商人数呈逐步递增的趋势。

（二）经商区域集中于蒙古、新疆地区

乾隆年间，“走西口”的移民愈益增多，忻代商人足迹也遍及全国各地，“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⑰，其中尤以在蒙古、新疆地区贸易的忻代人居多。依据有二：

其一，忻、代地方志的记载。忻州、崞县方志“孝义”和“节烈”记载中，提及商人经营区域，前往归化城和新疆贸易的商人有 7 人：郭利仁“有先人遗肆于塞外”^⑱；杨生荣父亲及弟弟都“至新疆贸易”^⑲；“张致中继妻贾氏，夫故，姑早歿，翁远出口外贸易”^⑳；郭培垣“往新疆贸易”^㉑；彭万山“贸易塞外”^㉒；光绪年间崞县李福春“初商归化城”^㉓。前往其他地方的只有 2 人：忻州方荣“商于奉天，历三十八年而不归”^㉔；忻州侯进璋父“赴山海关外”^㉕。

其二，其他地区方志及相关史料的记载。忻州人自乾隆起至同治年间，至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贸易，甚至有车驮贩茶以通俄罗斯者^㉖。嘉庆至同治年间，武川县工商业者主要是山西崞县、盂县、阳曲、代县、忻县、定襄、大同、太原各府县人，他们分别以同乡团体进行经营活动，店铺都系同乡性质，一县一业^㉗。包头市“商业在忻、代二县人掌握中”^㉘。俄国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横穿察哈尔右翼时，遇到的汉族居民“几乎全是忻州、代县人”^㉙。民国梁祥厚编订的《晋北忻定盆地概略》也记载了这一史实，“凡本省西北各县及省外之张家口、绥远、库伦、新疆等处，无不有忻定商人”^㉚。

二 忻代商人群体规模及经营内容

清代在蒙古、新疆地区经营的晋商人中，忻代商人是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尤其是土默特地区，仍有许多地方以忻州地名命名，其中亦不乏操着忻州口音的居民。忻代商人在晋商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其经营范围又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一）忻代商人群体规模

清初，内地商民前往外蒙古、新疆地区贸易，必须在乌里雅苏台将军处领取部票，乾隆二十五年改为也可在归化城、张家口两地领取。部票票尾须黏贴注明商人姓名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等的清单^㉛。下表为例举到塞外进行贸易七则部照及捐输名单档案，辅以方志及史料，对忻代商人在晋商中所占比例做大致推测。

忻代商人在晋商中所占比例表：

档案类型	年 份	总人数	晋中地区人数	晋中商人所占比例	忻代籍人数	忻代商人所占比例	其 他	所占比例
路照 1 ^㉜	乾隆四十一年	46	23	50%	5	11%	18	39%

续表

档案类型	年 份	总人数	晋中地区人数	晋中商人所占比例	忻代籍人数	忻代商人所占比例	其 他	所占比例
路照 2 ^③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95	46	48%	27	29%	22	23%
路照 3 ^④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18	8	44%	6	34%	4	22%
路照 4 ^⑤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	13	6	46%	4	31%	3	23%
捐输名单 1 ^⑥	咸丰三年	32	3	9%	13	41%	16 (其余为陕甘籍商人)	50%
捐输名单 2 ^⑦	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	6	2	33%	3	50%	1	17%
捐输名单 3 ^⑧	咸丰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7	2	29%	3	43%	2	28%

清代对商业票照的申请有详细的规定,票照需注明商人姓名、年龄、祖籍、相貌特征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等。商队由归化城前往乌鲁木齐贸易,商民申请呈送归化城同知,经由所辖兵司章京、兵司参领审阅,由副都统批准,方可发放票照。贸易完毕返回归化城后,需填写申请呈送迪化州知州,由迪化州知州报送护粮务道,再由事印房案呈送乌鲁木齐都统印务领队大臣,经批准后下发票照方可回归化城。在申请回城票照时,必须先查销前来贸易时归化城副都统发给的贸易票照。对于商人所领票照,地方大臣官员要仔细查验存案,限一年内返回,免其在外逗留生事。

笔者搜集到四件路照,均为归化城厅主事签发前往新疆贸易的商民路照花名册。清代归化城是在蒙古地区经商的商号聚集地,也是中原地区与蒙古北部、西部地区和新疆地区贸易往来的枢纽,故从路票记载的通行商人祖籍,可推测在蒙古、新疆地区进行贸易的各地区商人比例。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归化城厅呈复回归化城商民路照花名册中记载,到乌鲁木齐贸易的45个商人中,忻代商人有5人,祁县、汾阳、阳曲县等晋中地区的商人23人,其余为晋北右玉、应州和蒙地民人^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前往乌鲁木齐贸易的95个商民中,忻代商人27人,其中代州25人,忻州1人,崞县1人^⑩;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前往乌鲁木齐的18个商民中,代州商人有6人^⑪;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由归化城前往塞外贸易的商民13人,其中代州商人4人^⑫。可知,归化城设关后,在蒙古、新疆地区的商人主体为晋商,而忻代商人已发展为仅次于晋中商人的地域性商帮,其在蒙古、新疆地区经商的人数比例达到商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表中三件捐输名单,名单1为咸丰三年(1853年)叶尔羌捐助军饷商民花名银数清单,名单2、3分别为咸丰四年和七年阿克苏商民捐饷清单。叶尔羌是南疆著名的商业城市和民间贸易重要集散地。阿克苏为连接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吐鲁番、乌什等南疆富实城镇的重要关隘,是南疆仅次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商业重镇。在新疆地区的内地商人有晋、燕、湘、秦、蜀、鄂、豫、陇八大商帮,其中晋帮是在新疆经商时间最早、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商帮之一。三件捐输名单揭示了晋商在新疆的影响和地位。晋商到新疆有两条商路,北路从张家口、归化城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古城,南路沿草地与宁夏、甘肃的边界经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伊犁。蒙古草原是晋商进入新疆的必经通道,在叶尔羌捐输的内地商民中,晋帮占至一半,而忻代商人就占晋帮的41%,在阿克苏进行捐输的忻代商人也在40%以上。

(二) 忻代商人经营内容

忻代商人初由“春去秋来”的雁行商起家,规模小,资金少,所经营的商品多以塞外牧民及居民所需粮油日用品、手工业品、畜牧业品为主,兼营当铺业及茶业。同光年间开始在银钱业崭露头

角,规模仅次于晋中商人,民初时甚至超越晋中商人,20世纪30年代趋于衰落。

粮油日用品。蒙古地区是传统的游牧经济区,与中原地区进行粮食及各种日用品物资交换的需求旺盛。清初,清政府为平定噶尔丹叛乱,在西北地区常年用兵,为满足军需,在新疆、蒙古地区实行大规模“屯垦”政策,大量内地民人通过“走西口”涌入境内。乾隆年间,在内地民人集中的后套一带,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归化城五厅地方,土肥田广,粮裕价贱。如购买积贮,内地遇有需要,可就近拨济”^⑤。粮油日用品成为蒙古、新疆商人经营商品门类之大宗,忻代商人也不例外。河套一带颇有影响力的主营六陈行并兼营钱庄当铺的刘字号掌柜即是代县阳明堡人^⑥。乌拉特盟三公旗之商贸重镇中公旗的料铺业(即卖给脚户饲驼之粮豆的行业),营业数甚巨,多者年出数十万石,大部分出入掌握在忻代商人手里^⑦。《光绪东华录》光绪八年六月载,代州的刘廷邦由监生捐纳游击衔,在归化城等处开设粮店。民国时,山西代县白菜每年运销大同、归绥20余万斤^⑧;崞县及阳高县的蔬菜也销往归绥丰镇一带^⑨;五台山胡家庄所产花椒、桃梨销于归化、大同、丰镇等地^⑩。民国初年毕克齐的菜蔬经营者,以忻县、祁县、太原、定襄各府县人最多^⑪。

手工业品。归化城历史最久的银楼“万福兴”,自康熙年间开业,创始人为山西忻县人胡玉^⑫。包头市最为古老的三家商号之一如月号(其余两家是永合成和复盛公),是山西定襄铁匠梁如月于雍正年间开设,初主营修理箭头、钉马掌、加工生产工具等手工业,后兼营生皮业和日用杂货^⑬。代县生产的佛教用品如“红铜、佛像、木碗、木珠、漆器等运往归绥、多伦、五台山者,销售颇畅”^⑭;归化城“佛作行”和“圆作行”^⑮等手工作坊的坊主及工人一般来自代州和大同。

当铺、银钱业。忻州商人在嘉庆年间已在归化城一带经营。嘉庆四年(1799年),归化城等地有当铺40余家,几乎皆由晋商经营。其中察肃齐村有一家朱亥村有两家当铺均由忻州人经营^⑯。清末民初,忻代商人在归化城的银钱业经营渐盛,“以山西祁太帮为最,忻帮次之(清时祁太帮为盛,民国以来,忻帮较盛,近年来亦不振兴),代帮及同帮又次之”^⑰。

畜牧业品。清末民初张相文对塞外草原地区进行考察时,夜宿于后套乌拉河西畔一户山西忻县人家,经过交谈得知该户主从事的就是畜牧业,其“不耕而牧,兼业茶布经商”^⑱。

至乾隆年间,忻代商人在内地商人中所占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已发展为仅次于晋中商人的群体,在塞外商界尤其新疆地区地位不可小觑。但从其经营内容看,忻代商人经营内容多局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手工业品,金融业如银钱业、典当业等虽有涉及,但主要掌握在晋中商人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忻代商人多为中小商人,鲜有大商人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民初晋中商人遭受重创,忻代商人始在银钱业崭露头脚,方有邢克让等大商人出现。

三 从忻代商人个案分析揭示忻代商人衰落原因

乾隆二十六年归化城设关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蒙古、新疆地区忻代商人在塞外商界的地位也愈益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银钱业崭露头角,民国初年超越晋中商人;另一方面涌现出许多如王廷相、周朴斋、邢克让等商界精英。但至20世纪30年代,忻代商人又很快趋于衰落。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其鼎盛期虽有许多商界佼佼者,但多属于中小商人阶层,没有出现类似晋中祁、太、平地区乔氏、常氏、渠氏^⑲等资产百万两以上、店铺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大商巨贾;二是其异军崛起又迅速衰落的原因是什么。以下对具有代表意义的忻代商人个案进行剖析。

1. 忻州诰封武翼都尉周公朴斋,先世以贫无生产,移家于萨拉齐,勤苦治生,粗能温饱。公继嗣于世父锡嘏公。锡嘏公弃养时,公年甫十五,兄复斋公年十八,兄弟继先业,协理谋生,不数年而少有,又不数年而富有,迨公年四十余,已累资巨万矣。公以塞外非首邱地,复移家于故土。晚

年家益丰，忻州屈指巨室者，必及于公。方公壮年时，勤瘁治生，冒寒暑往来塞外，手足皴□，面目黎黑，虽少藉先世遗基而继长增高，皆由与拮据经营而来，得之亦不易矣。得之难，惜之必甚，慷慨施予之事，出于席厚履丰者易，出于铢积寸累者难。然公轻财好义，姻族之贫急者无虚，日亲串之。婚丧不举者谓饮助，晚岁取积年借券焚烧之，遇荒年指囤周济无难色，得之甚难而出之甚易。以故，公虽骤富而感颂者多，无妬怨者。昔为伏波游牧塞外，三致千金之产，辄自散之。自古贤豪之士，其识见度量与世之，仅知守财者不可同日而语矣。（《诰封武翼都周公朴斋八十寿序》）^⑤

2. 先生名廷相（1815—1898，任大盛魁大掌柜），字良弼，崇先公之长子也。生而聪颖，髫大才，读书十行俱下。家苦食贫弃儒学，陶米业于乌城。常人之常，善则相争，过则相谏。先生代同辈任过，虽屡次受责而不为辩，其负性忠厚有如此。迨后稍能自立，即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见人有客塞外而落魄者，必给资金以遣之，故者必施棺衾以殓之；欲归荐而无路费者，必助路费以归葬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数十年如一日也。更可重者先生从贫苦中亲身起家，与弟分家之后用己财延名师培养子侄读书，以补平生未遂之志，费甚巨而无吝嗇。弟屡年所欠外债，无虑千万，悉代偿之。（《王廷相墓志》，成文于光绪二十六年）^⑥

3. 邢克让，字揖卿，乳名三丑，原平镇人，光绪八年生。光绪二十四年弃学从商，后到绥远开设“蔚隆泰”钱庄，一次垄断绥远甘草收购市场，获利白银5千两，一时成为绥远商界名声显赫的人物。后由当地财团“大盛魁”出资，开办“通盛远”银号，邢克让任“通盛远”银号经理，同时兼任“乾丰”经理。民国12年（1923年）投靠绥远都统马福祥，任绥远都统府参事、绥远筹饷局总办、绥远会会长，自称“山西第一商人”，在官场出尽风头。晋北镇守使张树帜曾以大量投资入股邢克让，在塞外开设商号，经营投机生意。民国14年北洋政府派冯玉祥系李鸣钟为绥远都统，邢克让代表绥远商民写信挽留马福祥，被李鸣钟扣押。保释后又在天津开设“蔚泰汇兑庄”，继续从事金融投机生意，民国25年冬病亡^⑦。

通过对以上忻代商人代表人物周朴斋、王廷相、邢克让经商的人生轨迹进行解读，可以总结出忻代商人从商之特点：（1）出身贫寒，勤苦经营，靠乡人引荐进入商界。周朴斋家族虽属个人创业，但过程极为艰辛。其他两位均为学徒工出身，王廷相20岁时随叔父到归化城大盛魁商号当学徒，后成为大盛魁大掌柜；邢克让先由父亲通过熟人引荐，在家乡代县阳明堡刘雨田为其孙子开设的酿酒作坊当学徒，后经二哥邢克恭介绍，到归化城崞县同乡开设的钱铺当司账^⑧。（2）具有传统商人的特点。周朴斋、王廷相具有明显的传统商人的特点，好儒重商，积德行善，在对后人职业选择上的态度上，仍以读书科举为重。周朴斋三子，长子以捐“诰封武翼都业”，次子召南如州庠以教谕候选，三子召虎中道光癸卯科武举人，议叙游击公以例尉^⑨；王廷相则“用己财延名师培养子侄读书，以补平生未遂之志，费甚巨而无吝嗇”，其长子“宓诰封昭武都尉，次子以训导举孝廉方正，辞不就。……孙五人，曾孙十一人，俱读书以善事其家”^⑩。两人平时多施财于乡里，救助弱小，屡有义举，为乡人所称道。（3）渐具官僚资本家的角色。清末民初商人邢克让的发迹及败落也是忻代商人鼎盛期兴衰的缩影。邢克让出生于小商人世家，父亲厨工出身，长兄在家乡一家店铺当学徒，二哥先入归化城崞县人开设的“德义祥”钱铺当学徒，后升为坐堂掌柜，邢即在二哥引荐下进入商界，后任“蔚隆泰”钱庄经理。1917年，大盛魁聘请邢出任“通盛远”钱铺经理，成为归化城商界有名的人物。之后，邢克让走上一条官商结合的经商道路。1919年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和库伦驻兵司令高在田共同投资“乾丰”银行，邢克让兼任经理。1925年，因得罪绥远都统李忠鸣被下狱，出狱后依靠旧识高在田，任德国商人在津“天利洋行”经理。1928年，在天津办“蔚泰汇”总庄。

应该说，忻代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其发展壮大受到制约有诸多因素，除上述个人因素外，还要从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地方商业文化层面进行考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忻代商人没有抓住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综观中国商业史，地域性商帮兴起几乎都以国家经济政策为发展契机，清代晋商发展得益于政府在统一边疆战争中鼓励随军贸易的政策，浙商兴起则与清政府开放海禁密切相关。而面对难得的商业发展黄金期，具备商业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捷足先登者有更大发展优势。康熙年间，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为补给军需，允许皇商及小部分商人进行随军贸易，到蒙古、新疆地区的商人由此发展而来，其中多数为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等晋中商人。明末清初最为显赫的八家皇商之一范氏为山西介休人^⑤，蒙古地区最大商号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和张杰、史大学分别为太谷人和祁县人^⑥，他们均由随军贸易起家。从前文所述路照中商人籍贯的比例也可看出，至乾隆年间，在蒙古地区经商的晋中商人比例仍占绝大多数，而忻代商人或因经商规模所限，或因从商人员多处于商业低层，失去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没有抓住其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二，晋商用人机制不利于忻代商人的发展。晋商喜用同乡人，形成以地缘组合为纽带的商人团体，忻代商人也是如此，晋中商人在蒙古地区先行立稳脚跟，其中的大商号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与蒙古地区王公及地方政府关系密切，挤压了后起忻代商人谋求扩大商业规模的空间。如大盛魁“不要本地人，专要山西太原府附近十县的人”^⑦，这无形中缩小了其他地区商人进入商界的機會。大盛魁有确切记载的10位大掌柜中，7位是祁县人，1人为山西代县人，其余2人分别是右玉县杀虎口人和内蒙古托克托县人^⑧。上述三位忻代商人也均由同乡人推荐进入同乡人开设的店铺做学徒。晋商以地缘、乡缘关系缔结的经商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地缘商帮商业活动业务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给后起商帮的生存增加了难度。

第三，二元行政体制使忻代商人阶层的生存处境更为艰难。清政府鼓励内地民人进入蒙古地区经商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促进两地商业活动交流，故对商人在法律上有诸多限制。忻代商人由于错过了商业发展历史黄金期，发展缓慢，大多处于中小商人阶层。但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实行的是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由于两种系统所维护的群体利益不同，冲突常有发生^⑨。在蒙古地区经商的中小商人由于其商业规模及社会地位所限，无法与蒙古王公或地方官员达成良好的私人关系，故其生命及正常商业活动无法得到保障，被蒙古游民或土匪侵犯的事情时有发生，轻则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危及生命安全。在清代有关刑事案卷中，受到侵害的多集中于中小商人，而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样的大商号受到侵犯的案卷几乎没有。其中有关忻代商人的一则案卷极具代表意义。嘉庆十六年三月，忻州商民赵双元叔侄到归化城经商，行至中五力图地方遭到盗匪袭击财物被劫，赵双元叔父毙命。赵双元向归化城厅主事报案，后查明盗匪是当地游民，然归化城厅鉴于涉及蒙古盟旗而采取虚以委蛇的态度，后至被迫京控。而在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中，赵双元所佣工的归化城天顺永号店主赵俊伟并不肯为其出庭作证^⑩，由此可见中小商民之生存困境。

第四，忻代商人思想保守、墨守成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原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而忻代商人没有及时调整商业战略，而是继续沿袭传统的套路，走向衰败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忻代商人鲜有大商人出现还和其地域文化有一定关系，清代晋中地区商业气息更为浓厚，家庭“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⑪，且形成了独立的从商意识，汇商张石麟对劝他走仕途者表达了经商济世的思想，“人生事业在社会，果有济益，身即未服官政，对国家无不小补，奚汲汲仕宦为”^⑫，而忻代商人的思想和商业文化则逊色许多。

忻代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是清代晋商中的一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独特，经商区域主要集中在蒙古、新疆地区。自乾隆年间归化城设关至光绪年间，逐渐在塞外商界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仅次于晋中商人的商人群体，其兴起历程及商人经商轨迹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民国初年，忻代商

人在归化城银钱业的势力甚至超越晋中商人，在塞外商界显赫一时。但由于历史社会环境局限及地区商业文化差异，忻代商人鲜有大商户出现，多处于中小商人阶层。有关忻代商人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很多。如通过忻代商人，可对清代中小商人阶层的生存状况及利益诉求进行深入研究，亦可以其为中心坐标，透视清代二元行政体制下蒙古社会分层情况，中小商人与大盛魁这样的大商号之间的市场分割及彼此分工合作关系，与蒙地王公、地方政府和蒙地原始居民的互动，对祖籍地的地方政治经济制度、家族变迁及文化教育、风俗的影响，及对现今商业活动的指导意义等。

注释：

- ①王轩等纂修，高可、刘英编：《山西通志》卷三《图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2—298页。
- ②自20世纪20年代学界关注晋商的研究伊始，百年来研究晋商的著述颇多，囿于史料，有关忻代商人的论著很少，公开发表论述忻代商人的研究成果仅有宋丽莉《晋商程化鹏对海外茶叶贸易市场的开拓》和张炜、力平《商界谋士程化鹏》，对忻代商人精英程化鹏请求放宽对俄贸易限制、发展入俄境内贸易的事件进行了论述。
- ③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 ④《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食货志六》，引自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卷一百《大事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3页。
- ⑤④④⑤⑥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3册《山西省志》，求知学社1924—1926年版，第74、92页。
- ⑥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据光绪六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 ⑦⑧周人龙修，窦谷遂增订：《乾隆忻州志》卷二《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5页。
- ⑨以上数据来源：周人龙修，窦谷遂增订：《乾隆忻州志》卷四《孝义》，据乾隆十二年刻本影印；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二十三《孝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271页。
- ⑩⑪⑫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二十三《孝义》，第264—271页。
- ⑬贾瀛纂，郭丰铨、顾弼修：《乾隆崞县志》卷四《风俗》，据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4》，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 ⑭以上数据来源：潘肯堂纂，赵冠卿、龙朝言修：《光绪续修崞县志》卷六《人物志下·义行、节烈》，据光绪八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4》，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539页。
- ⑮以上数据来源：周人龙原本，窦谷遂增订：《乾隆忻州志》卷四《节烈》，据乾隆十二年刻本影印；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二十三《烈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271页。
- ⑯王时炯原本，王会隆增修分册号：《雍正定襄县志》，据雍正五年（1727年）刻本增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本影印；郑继修等修，邢澍田纂：《光绪定襄补志》卷八《人物》，据光绪六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3》，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379页。
- ⑰徐松霖纂：《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据同治四年修、光绪九年续修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4》，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 ⑱⑲⑳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三十三《孝义》，第369、369、367页。
- ㉑㉒㉓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三十三《烈妇》，第377页。
- ㉔潘肯堂纂，赵冠卿、龙朝言修：《光绪续修崞县志》卷六《人物志下·义行》，据光绪八年刻本影印，第514页。
- ㉕周人龙修，窦谷遂增订：《乾隆忻州志》卷四《节烈》，据乾隆十二年刻本影印，第129页。
- ㉖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三《晋省贫富强弱》，《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4—505页。
- ㉗㉘㉙（日）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版，第701、366、701页。
- ㉚王亦铭：《包头的蒙古行》，载《东河文史》第2辑，1985年版，第51—52页。
- ㉛（俄）阿·马·波兹涅涅耶夫著，刘汉明译：《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9页。
- ㉜梁祥厚：《晋北忻定盆地概略》，《西北论衡》第5卷第5期，1937年，转引自阎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 ㉝张荣铮、金懋初等点校：《钦定理藩部则例》卷34，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内蒙古内蒙古土默特旗档案馆藏清代档案，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80，10—1；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七日，80，10—41；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80，10—42；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80，10—43；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80，10—1；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七日，80，10—41；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80，10—42；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80，10—43。
- ⑬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三年呈叶尔羌捐助军饷商民花名银数清单》，档号 03—4261—063、03—4264—064。
-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呈阿克苏捐饷官员商民回子伯克等清单》，档号 03—4287—030。
- ⑯《清实录》第 17 册《高宗纯皇帝实录》（9）卷六七一，《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山西巡抚明德奏折》，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版。
- ⑰归绥一带的文史资料中有载，阳明堡镇南关村王里道的《刘氏家谱》（山西省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对此亦有记载。
- ⑱绥远通志馆编纂：《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十七《商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21 页。
- ⑲新计照：《呼和浩特民族用品制造业梗概》，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七辑《工商经济专辑》，1989 年版，第 72 页。
- ⑳沈许整理：《皮毛首户广恒西的六十年》，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包头史料荟要第 1 辑》，1980 年版，第 149 页。
- ㉑“佛作行”，专门为佛门及召庙中铸造佛像、供器的行业；“圆作行”则是除此之外的人民日常生活用具，诸如锅、碗、瓢、盆、茶壶、火锅以及箱柜上的各类饰物。
- ㉒数据来源于乌仁其其格：《18—20 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0—214 页），所引《归化城蒙古民事同知为饬行事将给发过所属各当商生息银两数目清册》，嘉庆四年七月，80—6—95。
- ㉓绥远通志馆编纂：《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三十二《金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3 页。
- ㉔沌谷：《塞北纪行》，载《地学杂志》第 6 卷第 7—8 合期，1915 年，转引自阎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7 页。
- ㉕常氏起家于张家口，是清代中国对俄贸易世家，乔氏、渠氏均起家于包头。
- ㉖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二辑《松龛先生全集》卷二，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1982 年版，第 265—268 页。
- ㉘㉙《王廷相墓志》，引自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忻州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忻州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忻州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9—560 页。
- ㉚原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原平县志·人物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3 页。
- ㉛山西省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邢守平：《山西省定襄县湖村邢氏原平支系（西南贾·原平镇）家谱续修本》，第 132 页。
- ㉜王谋文纂修：《乾隆介休县志》卷九《人物》，据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24》，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3 页。
- ㉝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旅蒙商大盛魁》，1984 年版，第 11、12—15 页。
- ㉟代林、马静主编：《大盛魁闻见录》，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 页。
- ㊱即对游牧型的蒙古社会实行盟旗制，对定居的汉族农耕社会实行府厅州县制。转引自张永江：《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二元管理体制》，《清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39 页。
- 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绥远城将军果勒丰阿《奏为山西民人赵双元等呈控劫抢毙命一案现拿获蒙古贼犯多尔济等审办事》，嘉庆十七年四月初九日，档号：03—2364—008；都察院左都御史德文《奏报在归化城贸易之山西民人赵双元等赴衙具控盗贼劫财杀人官员不为究办等情事》，嘉庆十六年八月初八日，档号：03—2220—019。
- ㊳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8 年 12 月 25 日，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8 页。
- ㊴《诰授奉政大夫张（石麟）公墓志》，转引自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0 页。

【项目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丝路经济带视野下清晋商西北与中亚贸易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YJC790023。

（作者郭娟娟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讲师 邮编 030006；王泽民 山西省右玉县文联研究人员 邮编 037200；刘建生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所长 邮编 030006）

（责任编辑 哈恩忠）